

台北輔仁大學

2011.11 校史室

壹、籌備復校



1950年10月北平輔仁大學正式為中共教育部接收，實質上結束了由聖言會主辦的輔仁大學。名義上仍存在的輔仁大學到1952年5月19日，也經由院系調整的過程，讓此一大學名稱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消失。北平輔仁在抗戰時期，因聖言會的國際背景，在相對自由的教育環境中茁壯，成為北平的四大名校之一，由於在讀書期間有緊密的師生及同學互動，輔仁校友們相較於其他大學，有更強固的凝結力。來台校友數百人先

組成非正式的校友會，隨著北平輔仁的結束，校友會欲使輔仁在台復校之念遂日益增長。

1956年7月15日輔仁校友會向台北市政府立案，正式成立。當時有校友及來賓兩百人與會。教育部長張其昀的出席，代表了政府對輔仁校友會的重視。他在大會中演講，說輔仁大學不同於其他大學，「仁」字是東西文化融通的標誌，而在抗戰時期教職員及學生，又充份表現了愛國精神，因此「各位校友正在籌劃復校事宜，兄弟站在教育行政當局的立場，一定予以支持。」



1956.07.15 教育部張其昀部長蒞臨校友會致詞

教育部長的支持主要在行政及法規方面，但私立大學的設立，需要大量的金錢及人力，則不是政府所應籌劃的。按輔大校友們的想法，復校事宜必須向過去主持輔仁的聖言會請求支持。1956年8月輔仁前教務長胡魯士神父（Henricus Gerardus Kroes, SVD）來台，校友們為胡魯士舉行了歡迎茶會，胡魯士表達了他歡迎輔仁在台復校的想法，並同意向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轉呈校友請求復校的上書。在這個積極的氣氛中，駐教廷公使謝壽康亦曾向教廷高層建言輔仁在台灣復校之事。但此事在1957年至1958年間逐漸沉寂，主要原因為經費，其次為對台灣政經狀態仍無足夠信心。同一時間聖言會在日本及菲律賓陸續籌設大學，而耶穌會則在越南西貢籌設大學。

1958年3月，曾在中國河南傳教的舒德（Fr. John Schutte, SVD）當選聖言會總會長。當時在駐教廷使館服務的羅光即向于斌表示：「為輔仁復校事，舒會長或可表贊成。」果然這位總會長在1958年11月訪問台灣，在台期間和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rchbishop Anthony Ribeiri）及校友會多次接觸，明確表達支持輔仁在台復校的計劃。問題的關鍵還是在經費，這位被公認善於組織規劃的總會長向教廷提出了九十萬美元的計劃，包括至少十萬美元買地，三十萬美元為了初期建築，以及初期五年，每年十萬美元的費用。

其時在台灣定位問題上較審慎的庇護十二世，已在1958年10月去世，新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對台灣教會展現更為支持的態度。特別能代表教廷立場改變的是傳信部署理部長雅靜安樞機主教（Cardinal Agagianian），在1959年2月24日訪問台灣。于斌總主教也被解除了來台禁令，2月初先雅靜安樞機一步抵台，校友會即與之接洽復校事宜。雅靜安來台時，于斌亦陪同訪視各地教會，其時正是台灣天主教會快速增長時期，雅靜安對此欣欣向榮的情況甚表滿意，對輔仁在台復校遂有更加支持之意。



1959.11.3 雅靜安樞機偕同于斌總主教晉謁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59年6月于斌至羅馬一行，主要就是談輔仁在台復校之事。面見雅靜安樞機時，雅氏詢以復校具體辦法。所謂具體辦法的背後，主要是聖言會在財力及人力上無法負擔，而教廷拿不出舒德總會長預估的九十萬美金。于斌對各方狀況已洞悉在心，次日即呈書面報告，建議邀集數個修會共同合作。雅靜安贊同其想法，遂請其與聖言會、耶穌會、道明會、方濟各會等接洽，並前往美國募款。

于斌1952年已在紐約市設有中美聯誼會（Sino-American Amity），是其在美國的根據地。藉由中美聯誼會及于斌的人際網絡，以及二次大戰後美國的經濟實力，是雅靜安命其在美國籌款的主因。但于斌自1959年6月底至9月底，在美國的募款工作並不順利，他的目標是百萬美金，但只有波士頓總主教谷欣樞機（Richard Cardinal Cushing）許下十萬美元，其他各教區主教告以其不可能，僅只能參與堂區小額的定

期捐款，一年或可有三五萬美金。10 月份于斌在羅馬向雅靜安報告籌募不順的消息，雅靜安仍然表明非辦不可的決心，並在 11 月 3 日任命于斌為籌備輔仁大學的校長。任命次日，于斌與雅靜安覲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表明願先捐助十萬美金，以為倡導。在本篤會美國修院聯合會籌備北平輔仁時，當時的教宗庇護十一世捐款十萬里拉以示支持，現在若望二十三世是效法前教宗故事，表示一脈相承，堅定支持。

雅靜安自己在 10 月 30 日又寫信給谷欣樞機，說明輔大復校之初需要一百萬美金，傳信部請谷欣樞機組織及帶頭去募集這需要的基金。「方法及程序等問題，由閣下您全權斟酌處理。」谷欣樞機接受了傳信部的指派，答應在未來兩年除原來的十萬美金，另提供輔仁大學九十萬美金。輔仁復校的經費至今遂有了基礎。

除了于斌代表中國教區神職，推動輔仁大學的復校工作外，聖言會（Society of Divine Word）是修會方面的代表，同樣對輔仁的復校工作有濃厚興趣。另外從傳信部的立場，則希望耶穌會士加入，因為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曾在中國興辦震旦學院及津沽大學。若耶穌會士能加入，則這所新的輔仁大學就更具有象徵意義。不過在台灣的耶穌會士一開始興趣缺缺，原因或許是對合作興學並不看好，到了 1959 年底，在耶穌會總會長的命令下，耶穌會台灣會士，成了共同興辦輔仁大學的第三個單位。

1960 年 4 月輔仁大學董事會成立。由署理台北總主教田耕莘樞機擔任董事長，在這次董事會中並且通過分地設校的原則，意即各單位建立不同的校區，好能避免權責上的衝突。同年 6 月，耶穌會和聖言會簽訂合作協議，決定聯合在高雄同一校園中運作。中國主教團則在台北尋找另一校地。輔仁大學復校在 1960 年是台灣社會的一個重大議題，在政府缺乏經費興辦公立大學的年代，以另一形式的「美援」興建的私立大學是頗受地方青睞的，一時之間各地方政府提供土地爭取輔仁前往設校的有二十餘處。高雄方面也進展順利，台灣省政府同意「撥公地四十三甲及新台幣壹佰五十萬元作為協助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之用。」



1960.03.01 歡迎田耕莘樞機主教歸國

在表面順利背後其實是波折不斷的。就中國教區神職選的北部校地而言，一開始的設定就是台北近郊且交通方便之處。現今交通便利的士林、淡水，當時都有交通條件上的限制。嘉義、宜蘭、花蓮的交通情況更差，只會是台北近郊找不到地時的不得已選擇。而地方所獻之地通常不是四方平整之地，開路整地或補償農地稻穀收成的費用，常多於直接買地的花費，此為當時由獻地轉為買地的原因，並非不接受地方政府的獻地。耶穌會及聖言會在高雄大貝湖的校地同樣面臨困難，這塊地夾在高雄市、高雄縣及屏東縣之間，三個地方政府為了分攤三四百萬元地上物補償，彼此僵持不下。在欲贈土地上，復有高雄工業給水廠之土地（以後的自來水公司），給水廠以水土保持、汙水排放等理由進行技術性阻擋，其間亦有整地費用、開路問題等，遂使此塊已簽約的土地遲遲不能移交。



宜蘭爭取輔仁建校



士林鎮獻地



大貝湖校地預定圖



新莊各界獻旗歡迎建校

貳、復校及初期發展

在校地問題陷入泥淖之際，1961年9月決定先設立文學院哲學研究所，此因研究所學生人數少，課程亦較少，可以吉林路復校籌備處為上課教室。9月20日上午9點，舉行了開學典禮，哲學研究所8名學生隨即開始上課，此為台北輔仁大學的開端。于斌校長同時任命高思謙神父為教務主任，牛若望神父為訓導主任，龔士榮神父為總務主任。

面對購地不順利的情況，聖言會及耶穌會在1961年底開始設想從高雄土地撤出，並且在台北與中國教區神職聯合在一共同校園的可能性。于斌校長考量與政府合作的關係，一開始並不贊成兩修會從高雄撤退，但地方政府一直不能解決土地贈送區塊及道路修建的問題，兩修會在1962年初正式決定從高雄撤出，並向教廷傳信部報

告，同意兩修會與中國教區神職，「在台北的共同校園中設立輔仁大學」。由於中國教區神職方面，除了復校籌備處，尚未得到任何土地，聖言會亦無在台北近郊買地的經驗，於是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Joseph Caprio）遂將此購地重任，交付已在台北有立足之地的耶穌會。費濟時蒙席（Eugene E. Fahy, SJ）是主要去尋找適合土地的耶穌會士。

由於台灣土地多數為小面積持有，因此增添了購買土地的難度。實際上三個教會團體的領導者並未直接涉入土地買賣，他們都是透過一些中間人，由這些中間人與個別的地主取得購買土地意願書，將小塊土地累積為大塊土地，費濟時在此過程中，似乎只是一個會議的召集人，了解各塊土地的進度。1962 年底舒德、田耕莘、于斌、高理耀、蒲敏道（Franz Burkhardt，耶穌會遠東省省會長）、費濟時等人共同聚集，一共考慮中和一塊土地，新店兩塊土地，經過評估，大家共議中和土地最好，新店次之。會議中聖言會的杜誼華神父（Bernard Doyle, SVD）曾提出新莊，但舒德總會長以煙塵過多否決之。

中和或新店的購地計劃雖已有買賣意向書，但真正進行時又問題叢生。有的是因為所購之地內有都市計劃，需要地方政府的同意。同時則有中間人稱，賣方希望提高價錢。杜誼華是當時輔仁計劃聖言會方面的代表，他說：「這裏面有許多陰謀、欺騙、骯髒交易及陷害他人正在進行，我不知道誰是可相信的，誰是可信任的。」結果一切購地的行動完全停頓，而這時教廷傳信部已不耐於長時間沒有實際進展，警告或將停止輔仁在台復校計劃。另一方面，德國方面也已提供二百五十萬馬克，若不能確定購地，這些款項或將被收回。

在于斌和費濟時不盡贊同的情況下，杜誼華再次將新莊這塊三十一甲的土地提出，因為經手的馬律師是為駐華教廷使館服務的律師，「每次請他做事，他總能很快很好的完成，以後也沒有麻煩。」在于斌和費濟時對中和及新店土地做了最後努力，但仍無結果後，他們在 1963 年 2 月 13 日有些無奈的同意買下新莊營盤里的土地做為校地。于斌不那麼喜歡這塊土地，原因是這塊地位於工業區中，地勢低窪。但他也說：「比輔仁大學舊址要大的多。」「大家過去對這地不滿意的人，也越看越順眼了。」在花三十餘萬美元買下校地後，1963 年 3 月開始興建文學院（文華樓）、法學院（樹德樓）、外語系（外語學院教學大樓）、家政系及理學院男生宿舍五棟大樓。



文學院（文華樓）



法學院（樹德樓）



外語系（外語學院教學大樓）



家政系大樓



理學院男生宿舍

語文學系設有英文及德文兩組，參加當年的大專聯招。當時教育部給的名額是 518 人，但實際入學的不及五百人。第一年的開學日期訂於 10 月 21 日，但是文華樓尚未完工，文學院的學生必須借用法學院上課。當時校園裏工程尚在進行，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難行，第一屆的同學其實是在一個大工地裏上課。第一屆的開學典禮，是在下學期初的 1964 年 3 月 1 日補行，可知至此時學校的初步規劃方順利完成。

1964 年理學院增設了物理、化學、生物三系，外語學系增設西班牙及法文組，同時設立語言中心，方便外籍人士學習中文。在 1965 年春至 1966 年，理學院大樓、女生第一宿舍、法學院辦公大樓、法學院圖書館、仁愛學苑、理學院辦公大樓、理學院綜合教室、理學院圖書館、女生第二宿舍相繼落成。……此時教學及學生事務的需求大致完成。學生人數也日漸增多，至 1966 年達 2 千 5 百餘人。

對於這種合作而分治的方式，即使在教會內也並非常態。一般的教會大學通常都由一個教會團體主辦，如此方能事權統一。可是在英美另有一種學院式的大學，名之為某一大學，但其實是以各學院為主。對聖言會及耶穌會方面來說，蔣百鍊及費濟時即希望能使輔仁朝向這種「聯邦制」的大學發展，而中國教區神職方面，則希望能盡量事權統一，減少各行其是的成分。雙方理念不同，磨擦即難以避免。二十世紀復為民族主義昂揚的時代，在實際生活中的經驗，或是教育過程中的提醒，都將反帝國主義塑造為正當行動，而耶穌會及聖言會的院務長亦皆為外國人，遂容易使權力分配問題，擴大為民族尊嚴問題。1965 年教育部曾寄來家長檢舉函，稱輔仁權責不統一，因此行政不健全，不遵守教育部規定。稱「外國籍神父當權，中國人以洋人惡惡之，以洋人好好之，……如此豈非洋奴養成所。……尤其在中國辦學，竟然不遵守中國法令，其有特權乎，亦或視我為殖民地乎？」這些具有濃厚煽惑性的字句，殺傷力很大，真正傷害了費濟時及蔣百鍊的心。在回覆教育部的信中，他們都提到當年中共鬥爭外籍傳教士時，曾使用過這些類似的言詞。他們也提到天主教大學在所有地方都會顧及當地的國家尊嚴、利益及青年福祉，絕非用來賺取資財。

在這樣國家尊嚴與外國捐助拉扯的氣氛中，蔣宋美齡女士擔任輔仁大學第二任董事長，相當具有象徵性的意義。首先蔣夫人並未擔任很多學校的董事長，她願意擔任輔仁大學董事長，一方面是她對於斌校長常保欽佩之心，另一方面是她了解並贊同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的理念。1967 年 6 月，蔣夫人首肯擔任名譽董事長。1967 年 7 月 24 日田耕莘樞機去世，董事會為繼任董事長人選思量許久，當于斌提出以蔣夫

人為董事長時，曾有董事以蔣夫人基督教徒的身份，擔心她干預校政，但于斌表示絕對不會，董事會遂在 1967 年 12 月 19 日選舉蔣夫人為董事長。蔣夫人擔任這一位不干涉校政的董事長，長達 25 年之久。



1967.6.29 輔大於中山堂舉行在台復校後第一屆畢業典禮，蔣宋美齡夫人接受出任名譽董事長聘書。

1967 年第一屆大學本科的畢業生共有 410 名，6 月 29 日假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畢業典禮，蔣夫人參加並致詞。在這一年教育部也核准設立中國文學研究所及歷史研究所。同樣是這一年，耶穌會的徐匯修道院，在 1952 年遷移至菲律賓碧瑤，此時已在輔大校園旁（514 巷）購妥土地，準備設立神學院，並向于斌申請與輔大建立關係。不納入輔大正式體系的原因，係「格於教育部之規章，無在大學內開設神學院之條例」，但著眼未來，應預為佈置。至於命名，中文稱「輔仁神學院」，西文名「Faculty of Theology Fu-Jen University」，這些都是期待未來教育部修改其反宗教的法規後，輔仁神學院可以順理成章的納入輔大結構中。輔仁神學院成立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學風亦有自由化傾向，不但是修士修讀神學的學校，也招收修女及教友，每年約有十幾二十位學生入學。

在輔仁實際的組織結構中，聖神裨女傳教會（簡稱聖神會）的修女們也自一開始就納入了共同創辦者的陣容中。聖神會與聖言會有共同的會祖楊生（Arnold Jaussen）神父，這兩個男女修會因此關係密切。在北平輔仁時期，聖神會修女們已經參與了「輔仁女子部」的運作。因為有這樣的歷史淵源，聖神會修女們名正言順的加入台北輔仁的運作。她們不僅是宿舍的管理者，她們在外語系、家政系及化學系皆有修女擔任教職。但和 3 個男性的團體不同，修女們並不承擔任何財務責任，聖神會僅

致力於人力的提供，在 1963 年有 4 位修女來到輔大，其中有 2 位曾在北平輔仁服務，她們是吳秉雅修女（Urbania Thueshaus）和鮑德明修女（Edna Polt）。到 1966 年修女增加到 13 位，以後經常保持十幾二十位的數字。特別為曾住宿的女生及民生學院的學生，聖神會修女是他（她）們重要的記憶。



聖神會修女與北平輔仁女子部教職員合照



1969.3.28 于斌擢升樞機主教，由教宗保祿六世為于樞機加冠

1969年3月，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拔擢于斌校長為樞機主教。這當然並非因為輔仁創辦有功，而是表彰他多年對天主教的服務，保祿六世的另一用意也是要平息教會內外對於于斌的抨擊，肯定于斌是以宗教立場適度的參與政治及社會活動。不過無論如何，一位不在其位的教區主教，以大學校長的身份獲得樞機主教榮銜，對輔仁大學及台灣教會都是一種殊榮。誠如蔣夫人所言：「在這個時刻您當選為我國樞機，實在是輔仁大學和台灣及大陸同胞的光榮。」

于斌獲得樞機榮銜，並不代表他或中國教區神職在輔仁大學有更多主導權，基本上仍是三個單位合作分治的狀態。于斌在這種狀態中若要對輔仁大學有所更張，必須得到其他兩單位的支持。「海洋學院」的籌設，即是一件引起磨擦的事件。于斌在1968年經高雄市長王玉雲、議長陳啟川首肯，準備在高雄籌備輔仁大學海洋學院。如同過去故事，台糖公司願提供小港附近數十甲土地，高雄市政府亦表示過去澄清湖的土地仍可使用。但問題是校舍的硬體設施，當時預估是四百萬美金。聖言會及耶穌會對此計劃持保留態度，原因有二：一為權責問題，兩修會認為增設學院，應先與兩修會商議。二為經費問題，很顯然預估所需的費用，遠遠超過輔大的財政能力。因此董事會在1969年8月時決議：「這個計劃需要繼續討論以及獲得更多可接受的資訊；當所有的資訊都得到後，校長可將計劃送來董事會作最後的決定。」不過于斌的海洋大學籌備處仍在繼續，至1970年7月，因教育部不准輔仁大學在高雄設立學院，此計劃停止，籌備費用花去一百四十萬餘新台幣。

夜間部的設立則為一相反事例，于斌在1968年9月向蔣百鍊及費濟時表明，將在與日間部分立的情況下，由中國教區神職獨立辦夜間部。于斌認為耶穌會和聖言會是來辦日間部的，于斌是一校之長，有權在三單位合約未言明的部份，就非協議部份自作考量。于斌在同時任命立法委員林棟為夜間部主任，林棟自1969年1月任教務長一職，1969年8月又兼夜間部主任。林棟此前涉入「黃豆案」，判決無罪。于斌校長信任其清白，費濟時則感覺觀感不佳，希望以一神父代之，于斌堅不同意。凡此種種，都增加了輔仁大學三單位間的緊張氣氛。

1969年11月26日，一位在輔大附設國語中心念書的學生史恩德，在外語學院教室黑板上寫下「蔣匪」二字，適有德語系學生看見，認為係外籍同學污衊元首，

向教官報告此事。因外語學院為聖言會管理，故其處理結果應由蔣百鍊負責，蔣百鍊召見了史恩德，史恩德表示悔意，蔣百鍊遂決定不讓史恩德再住宿舍，但准其仍在國語中心學習中文。其時有人不滿蔣百鍊處理方式，遂向安全局舉發。在國家尊嚴的帽子下，教育部再次來文糾正輔大組織架構，1970年2月7日，于斌、費濟時、蔣百鍊、龔士榮開會再商輔大組織問題，未有定論。費濟時及蔣百鍊視此為輔大內部問題，對教育部可以拖延處理，但3月10日教育部再嚴令輔大，要求嚴懲史恩德，嚴格糾正該「德籍院長」。對於行政體制，「現設院務長及各學院中分設之教務、訓導、總務等處應立即撤銷，該校教務、訓導、總務三處應與校長合署辦公，由該校校長統一指揮，以專權責。……限本年五月底以前將處理情形具報。……」

于斌校長在1970年4月赴羅馬教廷，他原本想經由傳信部及教廷教育部談與兩修會換約事宜，藉此徹底調整輔大行政組織，但在4月13日與教宗面談時，已提到由香港主教徐誠斌繼任主教的可能。5月30日輔大致函教育部，表示遵照教育部命令辦理行政組織的調整，實際上是「凡法令所不允許之名義，在本校各組織中不得繼續存在。」「各修會仍保持其獨立性。」「各單位，現有之財產與經濟，除有關全校性者及公共費用外，仍保持其原有狀況。」

1970年6月8日，傳信部致函于斌，稱徐誠斌不能來台任輔大校長，則其在中國教區神職中擇一有資格先代理然後接任，其時最適合者為羅光，時任台北總主教。7月中下旬于斌將辭職的消息傳出，一般外界的看法與行政組織調整有關，教育部在7月30日召集輔大常務董事開會，但只有費濟時出席，教育部長及次長均要求輔大在改組時不宜更換校長。蔣夫人也找人傳話，若于斌不任校長，她亦不任董事長。教育部尚請外交部轉告教廷，謂其要求輔大改組及于斌不准辭職。在教育部及輿論的壓力下，8月6日召開的輔大董事會，主教董事們一面倒的支持于斌續任校長，不接受他的辭職，於是于斌樞機繼續擔任輔大校長。于斌已經辭職，教宗已經接受，而教宗的命令不可更改。教廷為教宗解套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延遲于斌辭職的時間，這一延遲就到1978年。

在風雨不斷的1970年，綜合體育館「中美堂」落成了。這個建築的主要經費是由為于斌募款的李奠然神父，在美國捐募而來。迄今為止，



1970.6.23 蔣夫人特來主持中美堂落成剪綵，樞機因腿不能行走，而坐輪椅歡迎。

中美堂可說是輔仁大學的地標，位於校園中軸線的尾端，與中正路的校門遙相呼應。中美堂的圓頂造型，一方面是以天壇為師，另一方面圓頂下的波浪拱圈意向，則取法於羅馬競技場。中美堂名稱的由來，第一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二是「中正」、「美齡」各取一字，據當時的職員回憶，落成啟用前，蔣總統與夫人曾輕車簡從前來視察。6月23日正式落成，並首次在中美堂舉行畢業典禮，蔣夫人以董事長身份剪綵並在畢業典禮中致詞。這個中西合璧，充滿「中華美學」的體育館，大型體育活動的汗水和加油聲、大型典禮的莊嚴肅穆氣氛，都是輔大師生的共同回憶。

輔仁大學的合作分治制，歷經初期的磨合，到1972年大致達到共識。在遵守中華民國法律的前提下，尊重三個單位聯邦制的性質。以大學法賦予私立大學董事會的權利，董事會由三單位及主教團成員組成。三單位各有3名董事代表，加上主教們共15位董事。而輔仁的校長應盡可能由三單位輪流出任。校長由董事會選出，並得到教廷教育部的認可。

1978年7月，教廷推遲于斌辭職的准許下來了。7月15日董事會接受于斌辭職，並聘請羅光總主教繼任輔仁大學校長。從1961年至1978年，輔仁大學從1個哲學研究所發展為4個學院、1個博士班、8個碩士班、27個學士班及夜間部13個學士班。學生人數從8位研究生，增加到約1萬1千餘（11,309）名學生。雖然離于斌復校之初的10個學院理想有一定距離，但已是具有相當規模的綜合型大學。

于斌與羅光在1978年8月2日交接，8月7日即傳來教宗保祿六世去世的消息。于斌樞機主教的身份，使他應該去羅馬參加保祿六世的喪禮，並選舉新教宗。于斌8月16日在羅馬心臟病發，突然逝世。因教宗尚未選出，8月18日在伯多祿大教堂舉行葬禮，參與教宗選舉的93位樞機出席。外交部的電報稱：「盛況空前。」于斌靈柩在1978年8月28日送往輔大安厝，「綴滿黃白菊花之鮮花靈車在廿輛警察摩托車、開道車前導下，……經民權西路、台北橋、三重市、新莊鎮。……安厝禮，先由嚴前總統致祭，政府代表及輔大董事會、輔仁大學（教職員生）與輔仁大學校友由羅校長領導公祭。」于斌這位台北輔仁的首位校長，安葬於輔大文鐸樓旁幽靜的角落，現在已花木扶疏，我們都相信于斌在天堂，一定仍然繼續守護著輔大。



1978.8.18 教廷於聖伯多祿大殿舉行追思彌撒



1978.8.28 安厝於輔仁大學于公陵园